

经济虚火不降 通胀难以根除

我们预计 2011 年翘尾因素在 2.7%左右，全年 CPI 涨幅将达到 4.5%左右；从性质上看，中国正处于一个通胀大周期中，目前通胀的成因极为复杂，不能把通胀问题完全归结于货币超发和输入性因素。它反映的是中国经济长期不可持续增长的问题。如果中国增长方式不改，结构不调整，这个局面仍然难以根本改变。

张莱楠

毋庸置疑，抗通胀是当下中国经济的头等大事，根据我们的测算，预计一季度和上半年翘尾因素均在 3.5%左右，全年翘尾因素在 2.7%左右，全年 CPI 涨幅将达到 4.5%左右，还是在可控范围内的，但我们更应关注中长期的结构性风险。抗通胀既要关注眼前又要惠及长远，不仅要治标更要治本，关键是要通过结构调整将中国经济内部的“虚火”降下来，否则一味紧缩，很可能伤及经济，抗通胀的成本也将十分高昂。

中国处于通胀大周期

从性质上看，中国正处于一个通胀大周期中，目前通胀的成因极为复杂，不仅有短期因素，更不能把中国的通胀问题完全归结于货币超发和输入性因素。

一些观点认为，货币超发是主因。的确，中国货币超发是不争的事实，2010 年 M2，72.5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7%，M1 的余额 26.66 万亿元，同

比增长 21.2%，这两个数据与美国同比，中国大体分别相当于美国的 1.21 倍和 2.13 倍，这是 M2 和 M1 的数据比较。而同期我们国家的 GDP 总量大约只是美国的 1/3 左右，这说明我国的我国货币支持经济发展的效率太低了。在中国整体金融市场发展滞后，金融工具不发达，蓄水池有限的情况下，这么多的流动性自然会实体经济产生严重的冲击。

也有相当一部人认为，中国本轮通胀主要是由于输入性通胀造成的。美国再度量化宽松是最大的外部因素。在全球复苏不一致的大背景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持续释放货币，美元作为“新兴”套息交易工具横行于各类资产中，全球经济显然还没有恢复到危机前水平，而黄金、铜等部分大宗商品价格却创出新高，这直接传导到中国国内的资源价格和 CPI 上。

事实上，我们确实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中国的通胀成因更多是结构性因素造成的，它反映的是中国经济内部的深层次问题。

中国通胀有深层次因素

第一，从要素结构上看，中国正在逼近“刘易斯拐点”。资源相对价格重估，原先比较便宜的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由于供应渐渐达到顶峰，价格将进入长期上升通道，随着低端劳动力的短缺和工资的增长，劳动力成本压力将扩散到更广泛的经济部门。长期来看，国内劳动力价格上涨将是国内物价上涨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第二，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速，农产品生产的基础成本上涨渐成常态，长期被低估的农产品正通过涨价回归价值，进入趋势性的上涨通道。就拿蔬菜价格上涨来说，中国城市周边耕地面积不断缩小，城市蔬菜自给率下降明显，越来越多的城市完全依赖客菜供应本地市场，多数大城市的蔬菜自给率不足 30%。菜地变高楼，蔬菜的生产者变为消费者，共同导致需求上升而自给不足。城市的过快扩张，农业及相关产业的低回报率及很多城市对其周边农业配套设施的忽略，使得在蔬菜产销各个环节层层加价，等等因素共同推动菜价居高不下。

第三是，高房价等资产价格的过快上涨反映的是中国经济有泡沫化和制造业局部空心化的倾向。中国传统增长红利的衰减导致了我们的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滑，特别是在成本大幅提高和销售价格不断下跌的双向挤压下，很多实体企业利润（中间层）迅速变薄，这样，

不仅靠实业起家的众多民营企业纷纷逃离实体经济，一些大型国企也不甘寂寞，当这些资产领域产生预期利润率大大超过，或者成倍超过制造业的利润率时，就会导致制造业的大量资金游离出去。而另一方面，中国的房地产对 GDP 的影响太大了，据测算，中国房地产业每年为国民经济的贡献率约为 20%-40%不等，按照中国经济平均 10%的增速，房地产业每年约为 GDP 贡献 2-4 个百分点的增速。同时相关研究也表明，房地产投资对关联产业的带动系数约为 1.93，房地产业还带动了水泥、钢铁等 20 多个产业的发展，这样的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行业，其任何的风吹草动足以牵动整个宏观经济。

因此，中国通胀问题实际上反映的是中国经济长期不可持续增长的问题。如果中国增长方式不改，结构不调整，这个局面仍然难以根本改变。

只有改革和调整才能治本

在货币紧缩效应累加下，中国企业将很快面临困境。面对经济の内忧外患，2011 中国经济必须突出重围，短期内可以通过政策紧缩对冲，但中国经济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必须通过改革、转型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才能根本解决。

（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后）



赴港澳抢购奶粉令谁汗颜

吴杭民

在经历了“毒奶粉”的不断嚣张和猖獗后，内地妈妈辗转港澳抢购奶粉，实在是令人五味杂陈。据报道，澳门奶粉供应商透露，由于货源紧缺，澳门的进口奶粉价格均有不同程度的上涨，当地部分进口品牌奶粉甚至已告断市。

如果你还记得三聚氰胺奶粉在这几年里，数次以其顽强的生命力重出江湖，我们就不会对内地游客掀起的澳门抢购奶粉潮感到奇怪。因为，尽管大家对“毒奶粉”担惊害怕、深恶痛绝，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事实是，企业自检三聚氰胺，已是 2010 年版《企业生产婴幼儿配方乳粉许可条件审查细则》的关键内容。如此的“监管”举措，会令妈妈们在“毒奶粉”的深刻记忆中放心地给孩子们食用吗？而且，尽管现在加大了打击三聚氰胺奶粉的力度，但谁又能拍胸脯给妈妈们一个保证，“毒奶粉”已经“断子绝孙”了呢？

从到香港抢购奶粉，到蔓延至澳门，原因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为了图个安全放心。在“广州妈妈论坛”上，很多年轻母亲都在发帖征人同去澳门买洋奶粉。尽管内地各大超市也有同品牌产

品，但她们认为到港澳购买的同类奶粉品质更高，而且价格也相对便宜，同样一罐奶粉一般比内地便宜 20 元至 50 元。实际上，原装进口奶粉品质相对高，花钱买一个心安，是很多妈妈的内心真实想法。

内地妈妈到港澳抢购奶粉，暴露的是奶粉行业质量的信任危机；“毒奶粉”之所以能不断嚣张和猖獗，折射的是质量监管的软弱和无力。可以说，在近几年那么多的食品安全事故中，监管部门主动介入、事先制止的，真的是微乎其微，更多的是疲于亡羊补牢，而且这个“牢”，补得也是令人无语，冷不丁，不知道又有什么“毒 XX”会横空出世，令我们胆战心惊！

内地妈妈澳门抢购奶粉令谁汗颜？答案是一清二楚的。问题是，这样的质量信任危机，在不断蔓延。去年年底有报道说，和香港只有一河之隔的深圳，很多市民带着自己的孩子赴港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他们表示，与在深圳接种疫苗相比，香港的价格和药效更具吸引力，更令人感到安全。

奶粉、疫苗，下一个要去抢购的，又会是什么？在内地妈妈到港澳抢购奶粉潮中，有关部门反思和警醒了吗？



中国超越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

经济总量第二名，中国发展真强劲。善待成就勿菲薄，反思瑕疵宜清醒。综合国力靠总量，幸福指数看人平。国富更需促政改，政经并进中华兴。

赵乃育/画 孙勇/诗

■元来如此 | Xiao Guoyuan's Column |

用工荒呼唤“制度替代”上位



肖国元

春节刚过，东部沿海地区的招工难现象已凸显出来。为缓解招工难，东部沿海省市各级政府和企业主动出击，前往中西部地区招兵买马。据报道，2月14 日上午，宁波外经贸企业赴广元专场招聘会在四川广元火热举行，共推出 5000 多个岗位。另有消息说，今年以来，近千个外省企业来昆明招工，这个数字是去年的十倍。

面对用工荒，许多人认为这是企业长期实行低工资政策造成的恶果。因此，提高工资标准，提高福利待遇，成了破解用工荒的不二法门。我们也欣喜

地看到，为了招到工人，不少企业开出优厚待遇。不过，值得深思的是，用工荒并不是今年的新鲜事。好几年前，广东、浙江等沿海发达省份就轮番出现过招工难现象。与此同时，企业也曾屡屡打出提高工资待遇的旗帜，到处招兵买马。但是，几年下来，农民工的待遇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而招工则更见困难了。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呈现出梯度发展格局，东部沿海地区率先沐浴改革春风，启动经济发展的车轮。这些地区的劳动力流动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当地农民进城，填补工业经济所需要的劳动力缺口；二是当沿海省份经济总量进一步增加后，本地地区的劳动力难以满足更大的需求，于是出现了劳动力的省际流动，中西部劳动力纷纷流向东部沿海省份，出现了持续超过 20 年的“孔雀东南飞”现象。

主导上述两个阶段的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因素就是“收入替代”。所谓“收入替代”，不仅包含较高的工资收入水平，而且包含了劳动者的选择性价值判

断。即在绝对低水平的收入状态下，人们偏向于迟即提高的工资收入等眼前利益。改革初期，新兴的工业经济具有较好的赢利前景，能支付较农业回报为高的收入。因此，为了改善生活待遇，许多农民弃农进城。本地农民进城加入务行列以及中西部地区的农民不远千里外出打工，都说明了“收入替代”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但是，收入，尤其是工资收入，只是农民打工回报的一部分。作为受工业文明、城市文明长期熏陶的农民工，经过二十多年的洗礼，他们逐渐接受了许多新观念，有了更高更多的要求，工资收入在打工回报中的估值下降了。他们非常清楚，除了工资收入之外，他们生活在异地，要面临许多无奈与困苦；工资之外的隐性福利、生老病死等社会保障以及他们后代的权益等，是眼前的工资所无法包揽的。

事实上，作为一个就业者，其劳动报酬是结构性的，既包括短期的工资性收入，也有隐性的福利补贴，还有长期性、终生性的职业培训、失业保险、医疗保障、养老保障等。但是，

由于农民工一开始就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与形象介入传统的用工体系的，与他们有关的劳动报酬制度设计并没有与通行的制度接轨，而是交由独特的机制来厘定——这样的机制表面上是公开公平的市场竞争，但实质上是存在缺陷的临时性制度安排。后来这种安排由临时性固化为长久性制度安排，于是，就形成了劳动报酬中的大部分由企业承担，对企业的直接影响不大，但对提高农民工的福利非同小可。这部分

因此，在现有制度安排下，要提高农民工的劳动待遇，光靠大幅度提高工资收入既不可能，也缺乏坚实的制度基础。工资报酬与企业效益直接相关，大幅提高工资将增加企业负担，令企业不堪重负，阻碍企业的发展。而非工资性报酬中的大部分由社会承担，对企业的直接影响不大，但对提高农民工的福利非同小可。这部分

■直言不讳 | Call a Spade a Spade |

农民对春耕贷款有“七盼”

夏志琼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凤城市支行组织专业人员对农户春耕贷款需求情况进行了调查。通过走村入户，调查发现农民春耕备耕的积极性高，对农业贷款需求旺盛。同时，农民对春耕贷款有“七盼”：

一盼贷款早投放。涉农金融机构尤其是农村信用社以往的做法是按季节发放贷款。现在农民备耕提前，对资金需求也经常化，如果仍按季节发放农业贷款，农民会因大家集中采购，从而带来生产资料短缺和价格上涨。因此，农民普遍希望涉农金融机构对春耕贷款早计划、早安排，尽量依据农民的需求来发放，以使农民能够有充裕的时间购买春耕备耕物资。

二盼送货上门。时下，农村进入春耕大忙季节。但由于农忙时节农村劳动力普遍紧缺，为了不误农时，农民希望涉农金融机构尤其是农村信用社及时组织人员下乡，增设临时服务网点，或者采取走村串户的方式，为农户提供系列金融服务，送货到家门口。农民期盼在贷款数量、担保抵押方式、办理流程等方面能手续简便，快捷高效，随到随办，现场打卡或拿钱，以方便他们尽快购买到农业生产资料。

三盼利率浮动别过高。涉农金融机构发放春耕贷款，其贷款利率最少要在人民银行基准利率的基础上再上浮 50%到 70%。由于去年以来央行已经连续 3 次上调了存贷款利率，一年期贷款利率已经达到 6.06%。如果再浮动 50%就是 9.09%，浮动到 70%则利率就超过了 10%，达到 10.302%，农民感到利率不低。农民对此的期望是，对信用记录良好的农户，应给予利率

优惠，甚至可以实行人民银行的基准利率，以促进信用体系建设并让农民从中体会到实惠。

四盼贴息方式灵活。农民希望涉农金融机构不要全部采取按月结息或按季结息的方式，对农户农业贷款还是要采取利随本清的方式来方便农民。因为农民收入季节性较强，不到收获季节很难抽出资金归还贷款利息。

五盼贷款期限适应农业生产周期。由于目前农业春耕贷款基本都是春放秋收，不能适应生态农业、设施农业等的生产需要，不少农民因为农产品没有到出售期甚至农民的粮食还没打完和售出，贷款就到期了。由于贷款本金比较大，普通农民一时很难凑齐，为还贷款有的农民甚至要去向别人高利借债。为此，农民希望农业贷款周期能更长一点，以适应农业生产周期的需要，减轻农民不应有的负担。

六盼到期贷款借新还旧。虽然去年大部分地区农民增收，但是由于去年不少地区受到严重的干旱和洪水等自然灾害，不少农户损失较大，致使去年春耕的贷款不能及时偿还，也导致部分受灾户由于底子薄，基础差，投入能力低，春耕生产困难较大。从调查看，有些受灾户既缺种子，又无化肥。农民期盼对于上年因自然灾害没有偿还的贷款能够放宽信贷政策准予借新还旧，在此基础上再多给贷一些，以保证这些受灾农民能够种上地。

七盼支农再贷款发放到农家。人民银行的支农再贷只能用于农业生产不可挪作他用，由于利率更优惠，农民春耕生产更希望使用到人民银行的支农再贷款，同时希望支农再贷的使用周期能更长一点，运用的范围更宽一些。

举办国际会议不妨由市场操办

唐卫毅

财政部、外交部近日联合发出通知，规范管理在华举办的国际会议。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全面控制国际会议规模和总量；不得擅自对外承诺提供任何免费服务；不得举办或承办无实质内容的国际会议；不得攀比会议代表规格；不发会议纪念品，不组织公款游览、参观等。

其实，在改革开放之初，由政府主导举办一些国际性会议还是很有必要的。一方面，政府部门通过举办一些国际会议，打开中国对外开放的“世界之窗”，架起对外交流的平台，以此既扩大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又让国际人士亲眼见证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取得成就。另一方面，通过举办各类国际性会议，也进一步加强了我国在经济、文化、科技、医学、教育等方面，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拓宽了视野，吸取了精华，提升了政府管理水平，进而有效促进了我国社会经济的科学和可持续发展。

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举办国际性会议在我国已呈现“遍地开花”的局面，乃至连一些县级城市及一些不具备资质的部门也打出了“国际会议”的旗号，以求一鸣惊人，拥有“世界眼光”，由此导致在我国，各类国际会议鱼目混珠，泛滥成灾。各地频繁举办一些粗糙的、低端的国际性会议，还是显示出主办方目的不纯，同时也让一些国际会议名不副实。特别是举办这些国际会议皆由政府来主导，势必大量增加公共财政开支，以及人力、物力的投入，劳民伤财。

我们在规范政府部门举办各类

国际会议的同时，也应当敞开思维和胸襟，鼓励国际会议的市场化运作。比如，是不是可以把一些国际会议的主办权、承办权交给市场，由市场来运作？在国外，除一些特殊的、具有国际高端性质的国际性会议由政府来主导外，绝大多数的行业性的、研讨性的、交流性的国际会议，都是由市场来操办的，而且通过市场化运作的国际性会议，不仅不需要政府投一分钱，还能够赚钱后缴税。据报道，目前世界上每年所举办的国际会议多达 40 万个，会议产值超过 2800 亿美元，可见国际会议的市场还是蛮大的。

目前我国有 204 个地市级以上的城市，绝大多数拥有机场甚至国际机场，都有高速公路、铁路甚至高速铁路贯通，像北京、上海、广州、杭州、厦门等已经成为知名的国际会议城市。我国国际会议的市场，潜力还是很大的。但是，假如许多国际会议都由政府部门来主导，用于举办国际会议的财政开支，肯定将是一个无底洞，其中不排除一些会议组织者借机中饱私囊。

因此，理应放开国际会议的市场，让市场去自主参与国际会议的举办和承办。市场化的国际会议更符合国际惯例。为此，我们应当转变观念，学会“打主动仗”、“打市场仗”。举办各种形式的国际会议一旦推向市场化，主办者、承办者将会充分考虑国际会议的成本核算和市场效益，而不会去“赔本赚吆喝”甘当“冤大头”。届时，或许我们在继续保持扩大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的基础上，还能够让国际会议成为增加市场效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得国际效益、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联系我们

本版文章如无特别说明,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如果您想发表评论,请打电话给 0755-83501640;发电邮至pp118@126.com。